

海权视角下马江海战致败因素分析及其现实启示

○ 艾 克

(中国华艺广播公司,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甲申中法马江海战是中国自有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被迫对外作战,也是清朝统治者实行避战求和的妥协政策以及因为落后而挨打的一个典型败仗。虽被贴上了“惨败”的历史标签,但马江海战对中国近代海军发展、中国近代史发展均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在新一轮以海权竞争、海岛争夺、海洋开发为主旋律的海洋世纪的大背景下,以海权的视角全面分析和解读马江海战的致败因素,对我当前打造蓝水海军、推动海洋强国战略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海权;马江海战;致败因素;现实启示

一、引 子

2014年8月23日,由中国华艺广播公司主办的“纪念马江海战130周年——海权意识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在福州马尾马江海战古战场遗址举办。^[1]二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的学者汇聚一堂,就如何加强当代中国的海权意识与海上维权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晚清史研究者往往单纯地将马江海战作为中法战争的一场战役或一个阶段来研究,^[2]不足以凸显其在中国船政史、近代海军发展史甚至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实际上,马江海战及其参战主体福建水师^[3]与中国近代海权意识萌芽(始于鸦片战争后期)、清末洋务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福州船政的创建和发展(始于1866年)、近代新式海军的建立与发展(始于19世纪60年代)等均有着

作者简介:艾克(1962—),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理事,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兼职教授。

或多或少的因果联系,甚至与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也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同样,在马江海战史研究上,当前国内文史界依然存在诸多争论,如战斗持续了多长时间^[4]、法军是“偷袭”还是“公然挑战”^[5]、法舰队司令孤拔是否在海战中受伤^[6]、法舰队是零伤亡还是小程度损伤^[7]、福建前线将领张佩纶、何如璋等人的战败责任认定及历史评价^[8]等。不难看出,由于新史料的不断发掘,马江海战史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方兴未艾,很多疑点和观点仍期待充分且真实的史料来印证和总结。

二、马江海战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影响

马江海战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结局令人扼腕叹息,历史教训万分沉痛。它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对近代海军建设、海权萌芽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甚至对当代海权维护、海洋经略、海军建设也有着不少警示和启示,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一是马江海战的失利促使清末社会强化对海防和海军建设的重视程度,是近代海军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转折点。马江海战后,福建水师损失殆尽,马尾造船厂惨遭毁坏,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的控制权落入法国之手,台湾军民抗法斗争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这些失败的苦果令清政府悔恨无比,慈禧颁布了“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要求朝廷就加强海防建设再次进行讨论,最终形成“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的共识。同时,清政府正式设立海军衙门,^[9]并为北洋水师订购德国钢甲舰和哈奇卡斯机关炮。至 1888 年秋,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成军,舰艇总数达到 50 余艘,计 5 万余吨,达到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一个顶峰。马江海战之败,唤醒了清末全社会重视海防、精练海军的意识,是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转折点。

二是马江海战是中法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它的失败直接导致清政府陷入“不败而败”的尴尬境地。马江海战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东南沿海战场的彻底失败,法军占领澎湖,进攻基隆,封锁台湾,以此为“质押”逼迫清政府就范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尽管此后清政府在陆路战场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等胜利,仍无法改变不得不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法新约》的结局。在战后商议划界时,慈禧曾痛心疾首地说:“此番立约,实系草草了事,朝廷吃亏在无水师”,^[10]并总结道:“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若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11]印证了包含马江海战在内的东南沿海战场是决定中法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

三是马江海战的失败客观上刺激了日本对清朝的觊觎之心,为日后甲午海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壬午兵变后,日本与清朝对立加剧,且日本处于力量对比劣势。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民权派积极要求实行对华强硬外交政策,^[12]但日本内阁和军部尚无法确认其军事力量是否能够比肩清朝。而马江海战对日本来说,却是一个弄清清朝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的良机。在开战的第二天,日本

陆军士官固寓泽就租船至马尾观察战况,带领日本留学生仁礼敬之等在主战场进行实地调查,获取了详细的战报,绘制“清法两军海战示意图”,于战后一个月呈交日本内阁。^[13]日本海军将官东乡平八郎甚至还专程参观了参加马江海战的法舰。^[14]1888年,日本海军参谋本部编写出版了《清法海战纪略》,对战争原因、军备对比、战斗经过、法军制胜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阐释。^[15]

四是马江海战的失败刺激了清末开明官僚和进步人士对政治变革的渴求,催化了清末立宪新政的产生及辛亥革命的爆发。马江战后,受福建水师全军覆灭的打击,洋务派官僚、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前上奏朝廷,批评“中体西用”式的“假革新”,提出要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在中国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观点究竟可上溯到何时姑且不论,但张树声的事例表明通过中法战争所显现出的劣势,一部分开明官僚和民间知识分子已开始认识到国家的强弱并不仅只取决于军事力量,还应包括政治制度等。洋务名士郑观应在马江海战失败后潜心著述完成了《盛世危言》一书。该书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商战”和“兵战”,即处于“战”的常态。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之中,曾经可以约束外国列强行动的“万国公法”已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自身必须富强起来,其中心课题之一就是开设议院,借此实现强国、“制夷”、御侮的使命。这些新思想引发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战,最终催动了立宪新政的实施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

此外,马江海战的历史教训和致败因素反思对当前海防海军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在战略上,清政府坚守对外妥协退让方针以及避战求和政策,实施被动防御军事战略,授敌主动,坐失先机;在战役指挥上,前线将领盲目轻敌,战备松弛,以至于战时临阵失措,舰队失去统一指挥,战局大乱;在战术实施上,前线将领违反海战规律,船集一处沦为炮靶,未能有效统筹海陆两军协调配合等,这些贯穿战前战中的战略失误、指挥失当、作战失策致使马江海战结局惨痛,教训深刻,也是为当前海防海军建设提供了警示和启示。

三、马江海战致败因素分析

马江海战的江面战斗仅持续半个小时,福建水师11艘舰船9艘被击沉,2艘重伤自沉,阵亡将士近800名。^[16]而法舰队仅5人死亡,15人受伤,军舰伤3艘。^[17]战争结果的巨大反差,自然昭示着其中的不寻常。实际上,战前,中法两军各自拥有自己的有利条件。法国舰队虽在装备和技术上占据优势,但福建水师属于主场作战,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若福建水师战略思路正确、作战指导无误、作战部署得当,较好地组织和发动军民群众,则完全有可能改变战局,甚至取得胜利。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苦果。

(一)海权意识淡薄、战略思维落后是马江海战失败的首要原因

一是传统陆权观念和“中体西用”思维严重制约清末海权意识的萌发。中国传统的国防思想重陆轻海,其核心是“拒止于水不如拒止于陆”,即视陆上安全为首要考虑,海防从属于陆防。虽然清末洋务运动已经显现出海权意识萌芽

的现象,但受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限,清朝统治者的观念难以转变,在马江海战之前并未给予海军足够的重视。同时,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严重阻碍了中国与世界思维的接轨。其本意在于不触动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前提下,仅在应用的层面借鉴西学,为我所用。李鸿章等人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唯独火器万不能及”。^[18]“中体西用”理念实质上是封建社会“重道轻器”文化的变体,而其反映在军事上,则变成过于重视以谋略制胜,轻视武器装备的研发;重视外交上的合纵连横,轻视靠自身的军事实力取胜。^[19]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海军自诞生以来就处于重重限制之中,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仅仅是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而已。

二是坚守避战妥协的防御性军事战略,致使有船不坚有兵不利。虽然洋务运动自我标榜“自强”和“御侮”,但当清朝统治集团陷入对外交涉、面临战争威胁时,惯于选择退让妥协的军事策略,寄希望于委屈求“全”。同样,马江之憾,也正是由清朝统治集团战和犹豫不定的妥协心理造成的。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不得超过 2 艘,时间不得超过 2 周。^[20]另外,在中法已经实际互为交战国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放任敌国舰队深入本国军事要地,滞留 40 余日,不能不算是中外战史上的奇闻。美国历史学家马士评价认为,“孤拔的来临使得清政府束手无策。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实力薄弱,而是因为在处理有关国际法的问题上,他们不知如何去做,诸如怎样叫孤拔退出港外。这就使船政局和所属军舰直接处在法国大炮的威胁之下。”^[21]正如西方军事家约米尼所说:“一支军队假使采取绝对的守势,则无论它的形势是如何有利,实力是如何坚强,终究还是被敌人赶出阵地以外去。”^[22]

(二)综合国力羸弱、海军战力落后是马江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马汉在《海权论》中认为,海权应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前者包括所拥有的舰队,包括附属的基地、港口等各种设施,后者则包括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量的总和。从物质形态上来说,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海洋层面上的综合国力。

中法在综合国力和海军战力上悬殊,是马江海战之败的物质原因。一是在综合国力上,法国处于强势,清朝处于弱势。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完成了产业革命的法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有着先进的军事工业,尤其是造船工业。马江海战前,法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是钢壳甲军舰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清朝受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所限,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才刚刚起步,1866 年才开始建立新式造船厂,早期只能生产木壳兵轮,至 1877 年才开始制造铁木合构轮船,马江海战前不具备制造钢壳甲军舰的能力。

二是参战舰队军事实力对比悬殊。一方面,水师舰队武器装备与法军差距大。参加马江海战的法国舰艇总吨位为 1.5 万吨,超过福建水师总吨位近一倍(法军最大的军舰排水量在 4000 吨左右,而清军只有 1400 吨);其动力设备均为复合机,但水师舰船配置的是陈旧的立机、卧机,二者最大功率的差距在三至四

倍之间;从火力配备看,法国舰队共有火炮 77 门,多为后膛来复线炮,而水师共有 45 门火炮,除 2 门是大口径火炮外,其余均为小口径炮,主要是前装滑膛炮,射程近,精度差,打击力弱。实际上,马江战前,福建水师的技术装备较法国舰队要落后几十年。另一方面,福建水师兵役制度与兵员素质也较为落后。新式海军诞生后,受体制干扰,始终未能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近代兵役制度。福建水师一直实行临时募兵制度,既难保证兵员数量,更难保证兵员质量。同时,水师平时训练应付了事,军纪较为涣散,“船散在各省,嗜好赌博,百弊丛生,各省用以应差转运,养而不教”。^[23]

(三)战役判断失误、坐失战争先机是马江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清政府坚守避战妥协的军事外交策略,不仅不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前线扬长避短,反而接连否定福建前线将领们提出的御敌之策,拱手将战争先机以及开战时机的选择权让予敌方。

一是弃险不用,拒绝“塞河”阻敌御敌建议。从闽江口到马江,全程约 40 公里,尤其是在闽江入海口处,地势非常险要,长门炮台和金牌炮台南北对峙,江面仅宽 387 米,均在两炮台的覆盖范围之内。守卫住该要冲,“则虽铁胁,亦难飞渡”^[24]因此,张佩纶与当时驻守长门的福州将军穆图善曾屡向朝廷请示塞阻河口阻敌于闽江之外,但均被清政府以“和战未定”、“群疑众难”为借口而搁置,^[25]以致于门户洞开,放任敌舰队深入闽江腹地。中法两军对峙时,张佩纶等再次建议塞阻河口以绝敌后援,但也被清政府无理拒绝。

二是不许先发,授敌以主动权,坐失战争先机。法舰队进入闽江后,清政府军机处专门指示福建将军督抚,“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26]对此,张佩纶等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给总署的电报和奏折中多次强调只有“先发”才能“制胜”,船政大臣何如璋也提出了“彼此兵船衔尾相拒,万一决裂,先发制人,后发即为人制。以法人横肆性成,临事必图狡逞,使各船静以待变,深恐为敌所乘”^[27]的意见。在距开战一个月前的 7 月 17 日,张佩纶再次呈递奏折,认为“熟审彼己利钝之势,不在敌强而我弱,实在敌狡我迂,既让以要害,复让以先机,彼处处攻心,我种种掣肘。兵机止争呼吸,臣固非一良其船炮之坚利而实惜我虞备之让,谋断之歧也”,^[28]对朝廷过于控制前线指挥表达不满。但是,清朝统治集团醉心于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妥协求和,指示张佩纶等“须奉旨”。这就等于彻底剥夺了福建水师根据战场态势时机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利。

可见,在塞河与先发问题上,福建前线将领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曾发生过往返多次的争执,它实际上反映了战与和、抵抗与妥协的矛盾。最终,这些矛盾都不得不统一到清政府制定的总的对外方针、政策上去。这也就是马江海战的悲剧所在。

(四)不谙海战规律、战术处置失当是马江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虽然张佩纶、何如璋等前线将领提出了一些可行性较强的御敌之策,其中不乏或可改变战争结局的正确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何等人就不应该承担马江

之败的责任。相反,马江前线将领在具体的战役战术决策处置上出现的失误和错误,才是致使水师舰队全军覆没的最直接原因。

一是盲目轻敌,违反海战规律,船集一处与敌对峙。孤拔舰队孤军深入闽江,处处谨慎,小心翼翼,而此举却被张佩纶等解读为法军畏惧胆怯。不谙海事的他们便错误地将近代陆战中军队数量多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的规律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认为舰船多少即可决定海战的胜负。张佩纶等判断,“彼(指法舰)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29]遂将原本分散各地的水师舰船调集至马江,与法舰队对峙,以图打击法军气焰。殊不知,在法军眼里,“这些木制舰船,没有护甲,质地脆弱,加之船上没有机关炮和机关枪,威胁不大,只能算是一些炮靶罢了。”^[30]

二是重要军情处置迟缓,延误作战准备。战前,张佩纶等忠实执行清政府妥协求和路线,为避免引起法舰误会,“严禁各军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子弹,并不准无命自行起锚”,^[31]不作任何战备,并禁止港内福建水师舰只移动,自缚手足。接到法国的开战通知后,张佩纶、何如璋等仍半信半疑,不是及时把这重大军情向各舰下达,却还想派人打听确实消息,甚至荒唐地派人请求法军改期开战。最终各舰只能仓促断锚应战,被动挨打,终致满盘皆输。福建水师与法国军舰相持一月有余,没有理由推说不及筹备;11艘军舰,另有水雷、各种小型舰只与两岸陆营,更无理由推说“无兵、无船、无械”。^[32]

三是拒绝军民参战请愿,未能形成军民抗战合力。孤拔舰队进入马江后,福州“居民震动”,群情激奋,抗战意愿极为高昂,但无奈均被前线将领所压制。“马江下流三十里尚干乡聚数万人上书制军请战,谓自备糗粮,杀得法人若干,官再发赏。制军怒斥其书,遣官镇压,谕勿乱动,谕者以军法从事”。^[33]“制军既不许战,复投幼帅力请,幼帅虽不拒,亦不从。”^[34]据称,当时民众建议派人乘夜潜水凿破敌舰,或用木筏和麻绳钩投到敌船上去,使敌船车叶子受绊,困住敌舰,但均被张、何等否定。同时,张佩纶还刻意压制福建水师官兵的请战激情,甚至“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35]

四是临阵失措,畏敌脱逃,未能组织有效反击。炮声响起后,船政大臣何如璋并未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而是立即离开距离马尾造船厂不远的船政衙门,仓皇出逃,当天逃至马尾以西十余里的快安,次日逃到鼓山,25日逃到福州城。^[36]同样,战争爆发后,张佩纶在开战后也,惊魂失魄,弃师退至彭田。而负责舰队实际指挥的副将张成也在开战后跳水逃命,^[37]各舰失去统一指挥,不得不舰自为战,战局顿时大乱。

(五)海军指挥体系缺失、福建水师单独迎敌是导致马江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清政府在打造新式海军时,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只重视造船“造器”能力的提升,忽视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更新、漠视近代军事制度和指挥体系的建立。以致于马江海战前,清政府尚未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对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进行管理和调度,因而四支水师互不统领,派阀之间勾心斗角,均以保存

实力为首要。

开战前,张佩纶等认为,如果南北洋和广东水师前来马尾助战,与福建水师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定可破敌。他在给陈宝琛的书信中写道,“敌人内港,若水陆夹击,截其后路,实可一胜”,^[38]又致函黄再同称:“法船在中国者仅二十余艘,若南北师船联络一气,视敌所向而尾缀之,即吾船不敌法船,而与炮台陆军相依附,是我三而当彼一,主客劳逸之势相较,则彼气沮而吾之理可伸。”^[39]张佩纶等前线将领也因此多次致电朝廷,要求及时调拨南北洋和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马尾助战。朝廷纳奏,向南北洋大臣下达了援闽旨令。

但遗憾的是,南北洋大臣悲观地认定,中国舰队以弱舰敌法军强舰,无异以卵击石,竟均找借口拒绝派船援闽,以保存实力。总理衙门就援闽一事奏报朝廷:“法兵船现已深入福州,张佩纶等迭请南北洋、浙、粤酌派兵轮策援,以为牵缀之计。而南洋电复:以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北洋电复:以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尾蹶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浙省亦以船少尚难自顾电复:均系实在情形。惟粤省拨去两船。”^[40]也就是说,清政府几乎全盘认可了南北洋水师拒绝援闽的理由,未作进一步的强制调遣。实际上,近代海战中有一个规律,即在一般的情况下,弱舰应该避免与强舰对敌,南北洋大臣可能或多或少懂得这个道理,因而不肯将他们手中的弱舰派来与法方的强舰对峙,以图保存实力。

四、现实启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却会重复规律和教训。只有能够从失败历史和屈辱历史中汲取教训、正视问题、善用启迪的民族才能够洗刷屈辱、不断进步。马江海战的致败因素,为当今中国海权战略发展、军事思想创新等提供有益启示。

(一) 强化海洋观、海权观的教育宣导,塑造全民族海权意识

马江海战之败充分体现了海权思维对陆权思维的绝对优势。自明清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已经落后西方国家近百年,时至今日,依然未能达到其应有的程度。当前,以海权竞争、海岛争夺、海洋开发为主旋律的新的海洋世纪正在形成,海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 130 年前的清末。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内陆民族,在步入新的海洋世纪时,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先机的船舶和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海洋战略思维的决策精英和高效率的执行人才,而这些精英人才必须产生在了解海洋、熟悉海洋、热爱海洋的民众之中。因而,如何进一步摒弃固守陆权的传统思维,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权意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是从学校基础教育和公民生涯教育入手,塑造全民全社会海洋意识。在海洋教育观念上坚持破旧立新,官民教育机构应大力推动海洋及海权知识的普及教育,阐释我在海域划界、资源开发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逐步纠正民

众在传统领土面积教育上的观念误区,推动 12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概念写入各阶段教科书,走进各阶段课堂教育,成为烙印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常识。同时,进一步完善海洋知识教育体系和学科结构,提升近代海战史和海军发展史教育比重,让学生清楚理解“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深刻内涵;继续举办面向普通民众的海洋教育活动,如海洋日活动、航海日活动、海军舰船开放日活动等,指导出版海洋系列科普读物,创设海洋论坛和海洋网站、摄制海洋主题影片等,进一步丰富学校教育和公民教育素材。

二是将海洋发展战略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将海洋文化发展纳入沿海城市建设规划。强化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阐释和普及,对其进行具体化、通俗化、卡通化处理,使之成为群众看得见、读得懂、谈得来的身边事,将海洋经略态势与民众日常生活,如汽油、燃气的价格波动相关联,从物质层面提升群众对海洋发展的敏感性、积极性、主动性。同时,还应将海洋文化发展策略纳入沿海城市建设规划。海洋文化具备开放开拓、崇尚流动、不守常规、敢闯敢拼等先进文化因子,吸纳、融合、贯通这些积极因子,有助于提升和开拓一个城市面向海洋、守护海洋、经略海洋的意识与视野。沿海城市应依托海岸、海岛、海港等天然优势,充分挖掘和激活其中的历史文化积淀,将海洋文化塑造成为城市文化、市民文化,融入到城市发展规划和市民生活体验中去,以此带动全市民众海洋意识的提升。

此外,还应强化涉海洋事务的内外宣导,营造有利内外舆论环境。应综合利用多种媒体形式强化对海洋工作的内外舆论宣导,将议程设置的重点放在我国所处海洋安全态势、重点海洋项目的规划和建设、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在展示我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的同时,及时全面地向国际社会阐释海洋纠纷的实质,消弭国际舆论误解。

(二)增强管控海洋的整体实力,提升造船与“造器”能力

一是打造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蓝水海军,提高控制海洋的整体实力。中国近代每一场战争基本上都是从海战开始的,海军被重创或者歼灭,制海权丧失,最终只能吞下割地赔款的苦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忽略了海军建设。“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当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难以奏效时,军事行动将成为解决海洋问题的保底手段。在面临新的海洋世纪时,我必须加速建设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在侦察预警体系、指挥控制系统、电子对抗能力、防空反导和反潜能力建设上下功夫,切实提升海军的战略威慑力和远洋作战能力。同时,还应强化海战场的规划和建设,加紧推进相关岛屿机场、港口等重大工程建设,加强海洋气象、水文等基础环境调查测量,为未来海上维权和军事斗争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海洋国防工业体系,提升国家总装造船能力。“制器”和“造船”是晚清海军近代化努力中最为重要、也最见成效的一环。起初,这种器物层面的努力似乎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然而,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下、外部环境扼杀等因素,洋务派的“制器”始终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陷

入了“落后—挨打—模仿—追赶—落后”的恶性循环。在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牢牢抓住培养高素质新型国防科技人才这一建设核心,把握好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一战略基点,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薄弱环节作为主攻方向,并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实现创新,探索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打造一批具备世界顶级造船技术、可用能用好用的海洋国防龙头企业。

(三)推动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创新,适应信息化战争模式

一是在坚持后发制人军事战略情况下考虑先发特殊情况。自古兵贵神速,取胜之道在于抢占先机。马江海战爆发前,中法当时已经互为交战国,福建水师本可以趁闽江退潮之时首先开战,取得战争的先机和控制权,但清政府和前线将领一味坚持“不开第一枪”原则,将战机和有利形势拱手让给敌方,最终葬送了海权复兴的大好机会。况且,彼时的孤拔舰队已经违反国际法,视我内河如无人之境自由出入,在此情况下,可不再考虑“打第一枪”所带来的舆论被动问题。

当前,随着精确制导弹等高精尖武器装备的普遍使用,在现代战争模式下抢占先机、先发制人往往能给敌方造成很大损失,甚至能“瘫痪”敌方军事通信和指挥系统,使其很难组织有效反击,尤其是在现代海战模式下,迟一步可能就意味着满盘皆输。自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打出其第一例先发制人战争后,美国本世纪所打的每一场战争无不采用先发策略,瘫痪对手指挥中枢,使其丧失还手之力。同时,日本也在考虑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保卫“西南诸岛”。^[41]因此,在当前反恐战争等新的战争模式中先发与后发界限愈加模糊的背景下,我国今后是否可考虑在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外,适当对先发问题进行研究,使其成为有益的补充选项。如果针对在何种条件何种态势下可以打“第一枪”以及对打出“第一枪”的后续行动能做出明确,在涉及我重大国家利益或一些不适用后发制人的关键时刻,可据此亮剑出鞘,用实际行动表达决心和意志,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培养与锻炼前线指挥官的临机处置能力。马江海战中,清政府不顾前线指挥将领张佩纶等对我形势的描述和判断,无理拒绝其塞河和先发的请示,并对前线指挥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干扰,致使水师在战役尚未开始时即陷入完全被动,最终导致错失战机,饮恨马江。诚然,根据上级指挥机关预判战争形势,下达作战部署和决心命令,是常规战争必须坚持的作战程序。但现代战争中战机稍纵即逝,很多具体的命令和指示需要由前线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临时下达。尤其是未来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因天气、地理环境等变化带来的武器装备性能、人员适应能力等战斗力因素变化,更加不容忽视。因此,只有在平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和锻炼,使临敌指挥员面对危局能够勇于担当,做到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灵活应对,从而在战场上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三是进一步提升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马江海战中,除水师11艘舰船外,还有岸防陆营20营参与战斗,但由于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以及协同

作战的周密计划,在水师战斗失利的情况下,陆营并未积极组织岸上防御,致使法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成功,不仅抢走罗星塔岸上的三门克虏伯大炮,还破坏了闽江出海口的沿江各炮台。

时至今日,人类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未来战争是体系作战,交战双方竞争的是作战要素集成能力,作战能力一体化运用能力。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有敢于扬弃旧的思维方式,摈弃机械化战争中陈旧过时的作战思想和理论,摈弃以陆军为主的平面作战思维,确立陆海空天电五维一体的立体思维,改变合同作战的小协同作战思想,确立联合作战整体协调的作战思维,充分运用信息化指挥平台,让各种协同作战行动打破时域空域节点界限,真正实现各兵种各单位间互联互嵌互融的体系作战模式。因此,进一步提高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并建立与之相应的指挥体系和训练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今后,我既要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联教联训创新发展,又要在联合背景下、联合环境中、联合平台上培养指挥人员的联合思维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四是加紧探索军民融合新举措、新模式。从马江海战的经过来看,张佩纶等前线将领若能积极组织早已群情激愤的马江两岸民众参与抗战,或者是采纳乡勇有关乘夜潜水凿敌舰、塞江口阻挡法军退路等建议,即便无法改变战局,但法国舰队绝对不会胜的如此轻松顺利。归根到底,是封建统治者天生害怕发动群众,或对群众有着天然的轻视心理。

当前,走在新军事变革前列的国家,普遍重视军民兼容、军民结合,不断推动军民兼容、军民结合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美国的“军事采办”模式、日本的“以民掩军”模式、以色列的“以军带民”模式已经较为成熟,其共同点是:高度重视把国防和军事需求融入国家建设总体布局,在装备研制、人才培养、军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军民兼容发展。实现军民融合,应切实落到实处,如探索构建军民融合式油料保障体系、军民融合式装备保障体系等,能由地方承担的就让地方承担,能共享地方资源就共享地方资源,这样一来,军队就可以集中精力抓训练和作战。未来,我应加大对适应未来战争模式的军民融合方式的探索,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四) 制定合理可持续的海洋人才政策,加大海洋人才培养力度

海洋人才是发展海洋事业的第一资源,也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根本保障,尽管我国近年海洋人才队伍建设已初具规模,^[42]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数量储备和专业素质上仍有不小差距,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当前快速发展的海洋事业对海洋人才的需求,也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我应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充分认识我国海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立足我国的海洋发展现实需求,研究学习发达国家在制定海洋人才政策时运用的理论、技术,使对海洋人才政策的决策与制定越来越科学、合理,逐渐完善我国的海洋人才政策体系,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一是树立大海洋人才观,政府主导强化海洋人才队伍建设。国家海洋部门

应将推广大海洋人才观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化各界对海洋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着力打造重点海洋人才工程,通过这些工程来起到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营造良好的海洋人才工作氛围。实施海洋人才系统工程,重点抓好海洋科技人才队伍、船员队伍、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海洋科技领军人才、优秀青年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打造优秀海洋科研团队。继续做好公派留学工作,为培养科研骨干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打下基础。同时,综合利用多种媒介平台,强化海洋人才工作宣传,吸引和招揽优秀人才投身海洋事业。

二是制定科学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海洋人才顶层规划。海洋人才政策就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机关为了满足海洋事业的长久持续发展,根据我国的人才政策和海洋政策,对涉海类人才的现状及供需情况进行分析,制定的海洋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流动或激励等的政策。我应重点分析和研究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国家或地区的海洋人才政策优缺点,根据我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人才需求实际,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现有的海洋人才规划;从过程层面要明确、统一海洋人才政策的制定者、完善海洋人才政策的执行漏洞和制定建立海洋人才政策的评估体系;从环境层面要全力营造海洋人才政策的人文、法制和市场环境,予以全面保障。只有在科学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海洋人才顶层设计指导之下,才能真正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建设一支满足海洋事业需求的人才队伍。

三是构建政府支持、高校培育、社会协作、军民结合的四位一体的海洋人才能力提升模式。政府支持主要体现在加强宣传、政策倾斜、增加专项资金等,从而为海洋人才提升自身能力提供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高校培育是提升人才能力的主要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合理的课程设置以及积极的与国外高校加强交流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海洋人才的能力得以提高。社会协作主要体现在社会氛围的良好形成,民间资本的投入,服务性机构的建立等方面,如设置社会性的研究机构等。军民结合指的是在船舶操纵、维修保养等方面培养可通用、可互转的复合型人才。海洋的社会性研究机构可以为海洋人才提供最新的海洋知识,各国海洋产业的发展动态,我国海洋开发现状以及不同的海洋人才所需具备的不同能力,为海洋人才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依据。

(五)探索两岸携手维护海洋祖产、守护海洋利益的新途径、新模式

沈葆楨巡台、马江海战以及百年海防建设史,构建了海峡两岸无法分割的经脉、纽带和桥梁。两岸有共同的海,有共同的海上基业,有共同的海上利益,有共同的权益和义务。维护海洋祖产、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是台海两岸同胞的共同诉求。由于两岸当前的特殊政治现状,在两岸探索共同用海、护海、守海的方法、途径和模式的过程中,应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步骤,从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做起,推动两岸涉海军事互信的早日建立。

一是破除两岸合作壁垒,打开在维护海洋利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面的合

作局面。虽两岸携手维护海洋利益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迫切性和可操作性,但距离真正实现合作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要两岸政治对抗和政治对立依然存在,只要两岸没有和平统一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基本共识,两岸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就会面临诸如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对抗、政治上的不能互信。因而,两岸应打开新局面,逐步推动两岸关系向纵深发展,在非敏感领域上实现实质性跨越。如在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搜救和渔业生产管理等方面,可先进行民间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待时机成熟后再推广至政府层面。

二是以协防南海为基础,尽快建立两岸涉海层面军事互信。两岸在南海上的默契与合作早有先例。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我军东海舰队两艘驱逐舰途经台湾海峡前往支援南海,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台湾军队不仅没有开炮,反而打开探照灯,让大陆驰援军舰顺利通过,甚至还打出了“祝共军兄弟凯旋”的条幅。^[43]1988年大陆南海舰队编队收复被占的赤瓜礁途中,在台湾太平岛守军的默许下,在太平岛停留一周时间进行补给和了解敌情。^[44]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往昔尚能如此,在两岸关系得到显著改善的今天,两岸携手维护海洋利益大有可为。今年3月,越南武装巡逻艇两度接近太平岛,台湾海巡署在进行驱离时,遭对方鸣枪挑衅,台方随后也开枪示警。尽管台军方称针对目前南海局势将加强南沙群岛太平岛的军备物资,但如果越南来犯,台军依托现有的武器装备以及现有的驻岛守军仍难以应对。但只要有大陆的坚强后盾,越南一不敢轻举妄动,二即便胆敢试水也难以讨好。因此,在当前南海诸岛主权和资源遭外国覬覦的严重态势下,两岸更应该携起手来,充分发挥“太平岛协防模式”的导向作用,排除美、日等域外国家的重重干扰,尽快建立涉海层面上军事互信,共护祖产,共御外敌。

五、小 结

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当前海权竞争规律,是我们面临新海洋时代的必然选择。无论在培育全民族海权意识上还是在创新军事思想上都需要有超越自我的胆略,只有勇于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老经验、老做法,自觉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在海权竞争中谋得先机、走得更远、收获更多,否则就会被大洋时代的潮流越甩越远,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曾说,失败历史就像一面雪亮的镜子,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态,也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马江海战落幕的130周年的今天,我辈应穿越重重历史壁障,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义无反顾地走向深蓝、经略深蓝,昂首阔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实现中华民族夙愿百年的海权梦、强国梦。

注释:

[1]目前学界对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的海战性质仍持争论态度,不少学者认为称之为马江战役或马江之战为好。本文采用福建学者陈贞寿在《中法马江海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一

书中的说法,认定其海战性质,一是因为马尾是一个海港,二是因为作战主体是中法两国正式海军。

[2]普遍认为,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江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3]严格地说,福建水师指的是福建省的旧式水师,而参加马江海战的应叫“福建船政水师”。1866年,福建船政成立后,旧式水师经过改造,成立了新的福建船政水师,与广东水师、北洋水师以及南洋水师并称中国四大水师。本文采用学界普遍说法,依然称其福建水师。

[4]《血与火写出了中法马江海战》(安宁,《炎黄纵横》2014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马江海战分为马江战场和长门战场,马江战场战斗持续半个多小时,而长门战斗持续了3天。而《马江海战到底打了多长时间》(余少林,《东南快报》2014年3月5日)一文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的《法舰集泊马江情势紧急请调兵轮援助及发给电码本》《马江法舰歼发戎军奋战实力不敌船沉厂毁》两份奏折资料称,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苦战七天七夜,并非当前学界公认的一个小时。

[5]《马江宣战考》(俞政,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论坛杂志社,1984年,第75-94页)、《关于中法马江战役的几个问题》(郑剑顺,《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和《甲申中法马江之役析疑三题》(龙永行,《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等论文认为,孤拔舰队没有偷袭,因其已提前向清政府提交了宣战照会,但《甲申马尾之役法国宣战史实辨误》(郑渠渠,《福建论坛》1983年第3期)考证认为法军是精心策划,假宣战之名,行偷袭之实。

[6]吴瑞虎:《侵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毙命之谜》,《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第61-62页。

[7]在早期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法国舰队在马江海战中未有人人员伤亡,只有3艘鱼雷艇受损。但《马江海战》(《福建日报》2014年05月19日,第A12版)等最新研究材料认为,孤拔舰队在马江海战中5人死亡、15人受伤、军舰伤3艘;《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一书认为,法国舰队最终死6人、伤27人,一舰未沉。

[8]戴学稷:《清政府与马江战役》,《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1-5页。

[9]赵芳芳:《回望北洋水师》,《海南日报》2009年4月27日,第B13版。

[10]萧德浩、吴国强:《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邓承修勘界日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转引自何平立:《略论中法战争之军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64页。

[11]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转引自何平立:《略论中法战争之军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64页。

[12]沈才彬:《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第59页。

[13]余少林:《马江海战再现新史料,日本留学生记录马江海战战况》,《东南快报》2013年12月20日,第A20版。

[14][日]小林一美:《明治时期日本参谋本部的对外谍报活动——日清、义和团、日俄三大战争》,见滕维藻等编:《东亚世界史探究》,汲古书院,1986年,转引自刘世龙:《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清末政治》,《史林》1995年第2期,第38-44页。

[15][日]海军参谋本部:《清法海战纪略》,海军参谋本部,1888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http://iss.ndl.go.jp/books/R100000002-1000000432552-00,2014-8-29。

[16]杨东梁:《马江风云的反思》,《中国文化报》2010年8月3日,第006版。

[17]《马江海战》,《福建日报》2014年5月19日,第A12版,转引自福建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军区政治部:《国防知识读本(小学版和中学版)》,团结出版社、海峡少儿出版创意基地,2014年。

[18]原文出自《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转引自刘波:《反思中国近代海战之殇》,《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第50-53页。

[19]刘波:《反思中国近代海战之殇》,《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第50-53页。

[20]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8页。

[2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转引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

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12页。

[22] [瑞士] 约米尼：《战争艺术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转引自陈唤侨、张杰：《甲午战争的历史反思》，《红广角》2014年第6期，第18页。

[23] 刘冰：《再评洋务运动》，《新课程学习（下）》2012年第4期，第17页。

[24] 此处引文及说明参考戴学稷：《清政府与马江战役》，《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陈培琨：《甲申抗法战役概略》（《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甲申马江战役专辑》第9页）。

[25] 萧芳：《海国屏藩：三江口水师旗营与中法马江海战》，《中国民族报》2007年3月9日，第A30版，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07-03/09/content_4776.htm，2014-8-29。

[26] 田秉铎：《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http://book.sina.com.cn/nzt/yc/daguowubing/index.shtml>，2014-8-31。

[27] 戴学稷：《清政府与马江战役》，《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5页。

[28] [清]《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http://wenxian.fanren8.com/06/09/59/7.htm>，2014-8-31。

[29] 张振鹏：《中法战争（五）之“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来电”》，中华书局，2006年，第433页，转引自张壮强：《清政府军事战略失策与马江惨败》，《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25页。

[30] [法] 罗亚尔：《中法海战》，转引自张壮强：《清政府军事战略失策与马江惨败》，《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25页。

[31] 张振鹏：《中法战争（三）》，中华书局，1999年，第131页。

[32] 见于潘炳年等人在参劾失职官员的奏折，转引自南帆：《马江半小时》，海峡书局，2012年。

[33] [清] 欧阳昱：《见闻琐录·马江战事始末》，<http://wenxian.fanren8.com/06/15/706/2.htm>，2014-8-30。

[34] [清] 欧阳昱：《见闻琐录·马江战事始末》，<http://wenxian.fanren8.com/06/15/706/2.htm>，2014-8-30。这里的制军指的是对闽浙总督何璟，幼帅指的是张佩纶。

[35] 刘晓霞：《揭开马江海战最悲壮的一幕》，《东南快报》2013年7月19日，第A31版。

[36] 南帆：《马江半小时》，海峡书局，2012年。

[37] 刘波：《反思中国近代海战之殇》，《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第51页。

[38] 张振鹏：《中法战争（四）之“复陈庵星使”》，中华书局，2002年，第383页。

[39] 张振鹏：《中法战争（四）之“致黄再同太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378-379页。

[4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法越南交涉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第1801页，<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80498&remap=gb>，2014-8-31。

[41] 胡若愚：《日拟先发制人保卫西南诸岛》，《北京晨报》2013年7月26日，第A22版。

[42] 王璇、王小杰：《我国海洋储备人才队伍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对策》，《中国渔业经济》2012年第5期，第140-145页。

[43] 张春英：《海峡两岸对南沙和西沙群岛主权的共同维护》，《军事历史》2003年第5期，第23-28页。

[44] 刘斯路：《解放军少将发声，两岸协防南海空间大》，《香港文汇报》2010年3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hb/news/2010/03-15/2169493.shtml>，2014-8-29。

[责任编辑：流金]